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爱国者之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

[美] EDMUND WILSON 著

PATRIOTIC GOR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爱国者之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

PATRIOTIC GORE

[美] EDMUND WILSON 著

胡曙中 王競 夏平 等译

Patriotic Go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y
Edmund Wilson

Copyright© 1962 by Edmund Wilson.
Copyright© Renewed 1990 by Helen Miranda Wilso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roux, Inc., 19 Union Square West,
New York, NY 10003,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爱国者之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
胡曙中 主 兢 夏 平等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上海欧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23.5 印张 586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501—3 500 册

ISBN 7-81009-714-8

I·055 定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是一部较为杰出的文学评论著作。作者埃德蒙·威尔逊继承了把一切作品作为其目标的维多利亚的文艺批评理论的传统，在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作用的理解上，他既表现出人文主义的态度，也表现出历史的和分析的态度。作者对历史的评论既有阐释又有评价，对文学既作评价也对文学作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独特的根源进行研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文人，他的此部作品标记着这一最有争议的文人的典型格调。作者声称其分析具有科学的客观性，但显而易见全书是受到作者对道德、英雄业绩、创造性和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偏见所影响。然而，迄今为止本书仍然是一部对美国文学史有着重要贡献的论著，埃德蒙·威尔逊亦被当代许多评论家公认为杰出的文人。

本书对研究近代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系美国匹茨堡大学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迈克尔·赫尔方(Michael S. Helfand)于1979年夏至1980年夏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期间推荐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之一，他为本丛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已列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学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

一九九一年六月

中译本序言

埃德蒙·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1962年)是一部交口称誉、不可多得的文学史,它标志着美国一位最赫赫有名而又最有争议的文人的典型格调,同时也代表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正是威尔逊本人的青年和求学时期——享有盛名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传统。

埃德蒙·威尔逊继承了把一切作品作为其目标的维多利亚的文艺批评理论的传统。对于这一传统在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作用的理解上,他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和进步主义的态度;对于以作品为其批评方向的这一传统,他表现出历史的和分析的态度。威尔逊(1895—1972)以其著作开拓了这一传统,并在他最后的20年内亲眼目睹了众多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开始使这一传统重新恢复生气,并赋予其崭新的内容。

威尔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从事写作生涯的,他对文学的范围和评论家的责任的观点,是由他那中上层阶级的新教徒家庭的影响和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受的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律师,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共和党人,一位爱国志士,后来成了新泽西的首席检察官,并曾被提名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中任职。在普林斯顿时,威尔逊攻读欧洲文学,参加了大学

的文学活动,对代表那儿大学生活的文化和知识的地方主义持批判态度。他结识了像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后来成为战争年代重要的文学人物,并与他们经常保持着友谊。他像许多这样的人,自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国外去服役,因此经历了文化的创伤,理想的毁灭和社会的异化,这些是他那一代许许多多人的生活经历。但是在欧洲的经历也使这些作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观点和立场,使他们对美国文明和文化具有崭新的洞察力。

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威尔逊不仅写文学评论,而且还写小说、诗歌、政治论著、自传、游记和《圣经》史的研究。《爱国者之血》代表了威尔逊经过最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完成的一部最杰出的历史评论著作。它也代表了威尔逊许多著作的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他写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既富有活力又无评论家的行话。他使用大量的引证和情节摘要,而且还往往作出自己的评价。他之所以形成这一格局,是因为他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从事新闻写作兼书评的工作。他所写的文章刊登在诸如《新共和》和《国家》等思想开明、政治左倾的杂志上,读者的对象是能写能读但不精于文学的人。那些可能对威尔逊论述的作品不甚熟悉的读者,很可能会喜欢《爱国者之血》中所使用的情节摘要和引证。此外,威尔逊论述的作品有许许多多形式,其中包括主要的和次要的文学作品、回忆录、政治论著、日记和通俗歌曲。他对这些作品形式的论述,为现在文学课的教学内容与当时作家所使用的作品形式的种类之间确立了联系。他也指出,不论作家把自己明确是属于南方或北方,是南部邦联或联邦国的支持者,事实上他们立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是一清二楚地存在着的。

拜读威尔逊在1940年写的题为“对文学的历史阐释”一文后,我们会对他在《爱国者之血》中的历史评论的实践有更好的了解。在那篇文章中,他阐释了历史评论的历史和种类,以及他对评论家的作用和文学的价值的观点。

威尔逊认为,历史评论是一个既作阐释又作评价的过程,即评论家不仅对文学提出自己的评价,而且也对文学作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独特的根源进行研究。威尔逊认为西方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的起源应追溯到18世纪早期意大利作家强巴蒂斯塔·维科,维科通过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起源的时代和地点的研究,阐释了其间存在的差异。威尔逊进而对19世纪评论英国文学的法国评论专家伊波利特·泰纳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阐释理论进行了描述。因为泰纳断言历史阐释与分析化学大致相象,所以他把历史评论所具有的成份规定为历史时刻、种族(即某一文化所形成的独特的性质和能力)和外界(即环境)。

威尔逊进而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历史分析的传统所作出的贡献。他认为他们的功劳在于把经济的成份加入到泰纳所规定的范畴之中,并还在于他们对经济基础和文化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这一分析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事实上,威尔逊的结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用社会史的哲学对文学进行的阐释正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和更加容易。”¹

威尔逊所作出的这一论断,其实是对受到斯大林主义文学评论家影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激进的评论家的反抗。有人认为:艺术的表达应直接支持国家的政府,即对艺术的评价主要应根据其对国家所产生的直接的和实际的作用而论。威尔逊说,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多半是苏联特定的历史经历的结果,因此“强调文人应该发挥政治作用,强调用政治作用来贬低艺术作品,本来就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45页)。在这段论述之尾,他对苏联的文学评论家和某些美国作家进行了抨击,认为他们想“定下一条指导全国文学的政治路线……只要美国幸运地还是一个非极权国家,我们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这种文学的历史评论”(“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47—348页)。因此,威尔逊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分析文学的起源和作用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他相信,如果政府允许作家能畅所欲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文学和社会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

威尔逊然后论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这一分析法是20世纪对历史分析法新增加的成份。威尔逊相信,心理分析法对人类性格基本结构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更科学的方法。正因为这样,这一方法允许评论家从传记型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作品。他说,如果运用得当,心理分析法可被用来去挖掘一个模式,一个理解艺术家性格的关键,那将有助于评论家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阐释,“人们关于自己孩提时代的故事可能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即使那些故事是根据后来的经历掺有,部分或全部的杜撰成份。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态度、吸引力和‘模式’对历史评论家具有极大的兴趣。”(“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49页)

他接着说,这种模式不只是为艺术家所独有,而且事实上它还可能对社会有洞察力。这样,对个人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社会的)理想及其疾患,因为细胞会显示出组织的状态”(“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49页)。用疾患作比喻,尤其能说明表示威尔逊特征的一个假设:即社会 and 艺术家都处于患病或伤残的状态之中,对于这一疾患的仔细研究会导致对个人的创造性和文化史有深刻而真实的理解,这一理解要比强调健康、明智或道德是行动和创造的动机那种较为流行的阐释更为深刻和真实。威尔逊的两部评论作品,《三重的思想家》(1938年)和《伤与弓》(1941年),对于或暗或明地受到这一代表他特征的假设所影响的作家进行了分析。在《爱国者之血》中,威尔逊通过对影响过美国内战或受到过其影响的许多不同的作家的论述,开拓了对美国文化分析的范围。

威尔逊说,历史评论家最后也是最传统的作用是对艺术作品作出评价。并不是历史方法要求评论家对作品进行好坏优劣之分。事实上,纯粹的历史视角可能会暗示,阐释是唯一特有的批判

作用。然而威尔逊毫不含糊地断言,如果“我们”没有作出诸如此类带有评价性的判断,“我们将根本写不出文学评论的论著”(“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50页)。在这个断言中,威尔逊使用了人称代词“我们”,这表露了他的批判态度的另一个方面,即他认为具有代表我们讲话的权威。诚然,威尔逊对文学赏鉴方面权威的任意性相当直言不讳。他说,对于艺术的好坏之分,其实没有真正客观的标准。评论家只有对书具有共同根本的“感情反应”,才能有效地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相对的优点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俨然以权威发言的那些人是“自封而又长存不废的”,并将“迫使人们去接受他们的权威……靠着辩才或武断的力量”(“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50—351页)。请注意,威尔逊在这一率直得令人啧啧称羡的分析中,已心照不宣地把他自己认定是属于这一闻人名流之列。

在这一评论中,威尔逊也流露出对权力所特有的一种兴趣。纯粹是这种权力(辩才之大力)使得评论家赢得并保住权威。事实上,威尔逊相信,文学和评论两者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具有对生活起着影响的力量。所有使生活富有意义、对生活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努力,使得它较容易地得以生存下来。他说,文学是有益的,因为它能告诉人们关于经历的有用的真谛,也因为它能从不和谐的成份中创造出和谐的模式,使得读者既能从感情中得到安慰,又能控制住感情:“这种安慰带来了力量的感觉,并随后就带来了欢快。它是一种有益的感情,它对我们说,我们已意外地碰上了一流的文学作品”(“对文学的历史阐释”第351—353页)。

《爱国者之血》体现了威尔逊在“对文学的历史阐释”一文中的观点与批判的实践。威尔逊似乎已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文人,而且其他的评论家也已承认,《爱国者之血》即使不是他最杰出的文学研究论著,也是属于他的最佳作品之列。查尔斯·弗兰克说,那是“威尔逊最称心如意的书——一部成功地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

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书。按威尔逊的观点,在那个时代中,商业主义和剥削开始主宰美国的生活。”²另一位评论家说,

威尔逊在《爱国者之血》中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对曾经负有盛名而现已为人遗忘的人们曾经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美国舞台的方式所作出的说明。此书所涉及的范围、分析的深度、以及对夸张情感的自然主义方法,使它成为他的一部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有谁能睿智地使如此众多默默无闻的中智之人为人知晓,对风云人物作出如此奇特古怪的认识,使得自己的主题如此意味深长?又有哪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已如此彻彻底底地将战争形成意识的方式警告过我们?(卡斯特罗诺伏第139—140页)

卡斯特罗诺伏的例举说明并不完整无缺。威尔逊还对为我国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男女作家进行了描述,并还清清楚楚地指出,历史环境不仅会塑造形象,而且有时也会扭曲形象。这本书描写了英雄的业绩,也描写了斗争、悲怆和荒芜。另外,在这本书中,威尔逊以传记型为主对战争的事实和经历作了一个相对性的透视:“这些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促使人们不停地往下阅读。这很像布朗宁的《戒指和书》:九个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叙述同一个故事。”³

正如威尔逊的评论所暗示,他这一研究论著的价值,正是他的传记型的方法和对此书的全局布局。虽然威尔逊声称尽力避免归纳性的描述,让他的事业和性格来暗示其寓意(《爱国者之血》第2页),但由于对主题的选择,具体情节的取舍,以及对篇章的安排,他不可能不对自己叙述形式和意义作出规定。然而乍看之下,全书的结构是由一系列传记型的篇章所组成,其中偶尔杂夹着一个表示主题或带有阐释性的标题或副标题(“作为宗教神秘物的合众

国”，“南方的不同观点”，“古老南方的神话”，“美国散文风格的简洁化”），这使得此书看上去较像威尔逊特有的写作手法，但其实却不然。威尔逊运用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结构上的方法，使得仔细的读者能抓住他历史性分析之要点。

他那充满论争气氛的序言表明了“形成我对这场战争看法的总的观点和立场”，明确了这一史学研究威尔逊对现代文明之批判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威尔逊的论点是，证明战争有理的大多数理由，其实并不是打仗的真正原因。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客观的”态度解释说，“人类之间进行的战争通常也主要是由像海参所具有的那种贪婪本性所引起，”（《爱国者之血》第3页）但是人类又不像动物，他们用捍卫道德和（或者）文明等辩护理由证明自己的贪婪和侵略是有理的（《爱国者之血》第3页）。威尔逊妥切地把海参与人类相比拟，这流露出他从心底里对人类侵略的厌恶，对他称之为“权力本能要求”的那种无理冲动的厌恶。⁴

他对为美国内战辩护的那些普遍的和官方的理由持怀疑态度，这是本书的一个固定不变的主题。他用了几个论述“神话”的篇章来证明自己持这一怀疑态度的理由，为了证明自己的暴力是有理的，北方和南方都对那种“神话”进行了发挥。他又对支持和反对南方脱离联邦的权利的种种政治论点——有普遍的也有严肃的——进行了解释，并还对形成公众对战争看法的流行歌曲和小说进行了论述。按威尔逊的观点，凡此种种都是理论上的阐释，是使人迷惑不解的阐释，它们并没有真正解释打仗的原因，而却是更多地解释了个人、阶级或国家的意识。

以北方为例，它为自己对南方的进攻所找出来的理由是：为了结束奴隶制在道义上的罪恶。然而威尔逊认为，北方的根本动机——部分地是由其工业化的经济所形成——是想把权力集中。他说，林肯想保持合众国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权力要求的形式而已，与俾斯麦在德国和列宁在苏联所起的历史性的

作用相类似。他说,美国人反反复复提出各种各样道义上的理论(神意,命定扩张论,自由和民主)来为地理上的扩张进行辩解,而他却认为那从根本上来说是侵略的行为。他的结论是,在现代,道义上的辩解已成了一种代表国家的风格:无论何时当我们在进行一场战争或潜近某一个其他的国家时,那总是为了解放某些人的目的。

对此话的真谛性,读者们将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在内战时期,北方把他们的神圣事业看成是对奴隶的解放,是对天意制定的合众国的维护(即维护合众国当时的组成成份);而南方也有其理由,正如威尔逊在第十二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假如北方人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那么南方人是在从商业化的北方社会的物质享受主义和市侩庸俗之中拯救他们的神圣理想——骑士精神、贵族式的自由、优雅的举止和豪华奢侈的生活。”(《爱国者之血》第357页)

按照威尔逊的观点,这些神话虽然流传甚广但并不真实,然而它们的确反映了美国文化史上的两个重要而又永久的特点:基于新基督教的道义上的正义性(“是对道义上的优越性之托词”)和溯源于英国贵族文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

此外,威尔逊还较详细地研究了南北双方的政治思想。他对南方为“州权”和脱离联邦所挖空心思找出的辩解理由进行了揭露,也对林肯为取消奴隶制所找出的法律和宪法(而不是道义)上的理由进行了揭露。因此威尔逊认为,内战从根本上来说是两条贪婪成性的海参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制造出一些从道义上为其行动辩解的“带有欺骗性的传统”,这些传统延续至今并仍对这个国家起着消极的作用。威尔逊说,北方赢得了战争,并不是因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是北方动员了精良的装备以及北方具有的精悍的组织能力。

这番话引出了威尔逊的另一大主题:即现时代的特点是创立

由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各大州，这一时代的发端是北方在这场首次的现代（即全面）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北方的胜利是工业主义和由中央组织的各州的胜利，因此是现代历史的发端。我们也可以读到，威尔逊出于道义但缺乏科学知识的缘由，对在这种中央集权下受苦受难或表示反抗不满的那些人给予极大的同情。⁵这一同情心自始至终贯穿在这一研究论著之中，但在威尔逊论述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为邦联脱离合众国作辩解所写的政论文的那一章里，这种同情心一目了然。威尔逊所同情的对象是为了个人自由进行斗争的人，他们虽不成功但却很英勇，而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传统的人，即便这两种人必然具有同一性。他对南方的矛盾感情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政治信仰、也许还有性格所反映出的主要矛盾上。一方面他对林肯、列宁和格兰特等强人取得了能组织和改变众人生活的成就表示羡慕，但另一方面他又羡慕为了自己的自由反对强大制度——甚至由他所羡慕的人所制定的制度——的那些人（以及他们所拥护的个人主义思想）。

威尔逊的前言以及论述南北双方官方的和普遍的思想的几个章节，为读者阅读作家传记型研究的章节提供了一个脉络，一个历史和知识的全貌。

显而易见，威尔逊把这场穷凶极恶、血肉横飞的战争看作是造成那些参战者在体力和心理方面创伤的原因，也把它看作是国家的创伤。这样，战争就成了既是个人又是国家从思想和感情上摆脱不了的东西，成了对国民性和创造性进行研究的一个有价值意义的主题。我们可以读到，在截然不同的历史场面下（就战争而论）的作家对战争和各种不同的神话的感受、容忍、摒弃或描述。因此这些传记型的研究必然会对威尔逊几个归纳性的章节所必要的平淡无味的论述作举例解释，作修改补充，因而也会使它们更加复杂化。我们可以读到，普遍的和官方的思想对于具有雄辩口才、受过教育的人们所起的力量作用及其局限性。威尔逊研究的作家

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有男性的也有女性的，有被授过不同军衔的战士，有记者，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城市规划设计师和一位法官。威尔逊的观点是，每一个作家既典型又无双。亲身经历过战斗的战士与没有战斗经历的政客对战争的看法是两样的。男女作家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然而在这些范畴之中，威尔逊也注意到不同的气质和风格。

总而言之，《爱国者之血》是一系列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承认个人的经历和表达内容上的差异性，然而把它们集中起来，它们又会表明对战争所作出的某些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反响。我们可以具体地读到，这一穷凶极恶的冲突是如何转变了个人和国家的生活。

威尔逊说，从这一转变之中呈现出一种文学，它在风格和观点方面都不同于战前的文学作品。例如，在“美国散文风格的简化：约翰·W·德福雷斯特”那一章中，威尔逊对这一文学转变的一部分作了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主要文学在风格和语气上受到了宗教布道词很大的影响，即使作品本身并不是属于宗教类型的。战争之后，“强烈的道义上的特性”已经淡薄，而且也不那么明显了。这一特性并不被和盘托出，但却“通过故事或诗歌体现了出来”。19世纪早期的散文文学具有一种稠密的“粘粘糊糊”的性质，一种比较迟缓的节奏速度，和一种超自然的兴趣，它很合那些在乡村悠闲宁静环境中生活的人的口味。（《爱国者之血》第526—527页）

威尔逊说，内战改变了美国的散文模式。它的节奏速度加快了，文风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故作高深，语气更加实际和民主了。他特别指出，这一文风从战场的交往实际中脱颖而出，后来被用于像尤利塞斯·S·格兰特那些军人所写的回忆录之中。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是一篇简洁朴素的演说词，它是这种雄辩术新模式的又一例证，这种新模式是“一种有节制性的直言不讳”，它在美国逐

渐地取代了较冗长考究的古典模式。在文风上的这种渐变,仅仅代表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那种复杂的文学和文化运动不断增长的一个方面。而且,人们也可能注意到,追求文风简洁这一目标是由从不与人争辩的沃尔特·佩特在英国开始实行并提倡的。他在美学领域内对那种堆砌词语和矫揉造作的现象表示了清教徒似的和实利主义的厌恶:无疑战争和商业促进了这种文风的发展,就像大多数复杂的文化活动一样,这种文风的发展也是受到了其他因素过分的影响。然而威尔逊提高了我们对这一转变的理解,并还把战争的影响追溯到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文化领域。

《爱国者之血》代表了一种由学问渊博的文人所创立起来的独立的、甚至有点异乎寻常的历史评论。虽然作者声称其分析具有科学的客观性,但显而易见全书是受到了他对道德、英雄业绩、创造性和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偏见的影晌。他那过分自信的评论风格(融学识和辩论术为一体),在知识和风格方面与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当代作家爱德华·P·汤普森那些有一定观点立场的社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一脉相承。属于另一流派的当代历史学家由于受到米歇米·傅科的巨大影响,会认为威尔逊对创造性和英雄业绩的兴趣以及他的传记型方法有点不合时尚。

《爱国者之血》迄今为止仍然是一部对美国文学史有着重要贡献的论著,其作者埃德蒙·威尔逊被当代许多评论家公认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的成就及其渊博的学识在一个学术不断专业化并不断与社会相脱离的时代中难以重复出现。

迈克尔·赫尔方

(Michael S. Helfand)

(胡曙中 译)

中译本序注

1. 埃德蒙·威尔逊：“对文学的历史阐释”，刊于刘易斯·M·达布尼编的《埃德蒙·威尔逊文集（简本）》（纽约，1983年）第344页。对本文的引文在下文中用以下的形式来表示：（文章名，页码）。
2. 引文来源于查尔斯·P·弗兰克所著的《埃德蒙·威尔逊》（纽约，1970年）第67页。其他论及威尔逊的作家对《爱国者之血》的评价也基本相同。刘易斯·M·达布尼把它说成是“内战时期美国意识的一部历史，威尔逊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一部被公认最杰出的著作”。戴维·卡斯特罗诺伏认为它是“威尔逊对美国权力所持观点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是威尔逊最令人钦佩的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见刘易斯·M·达布尼编的《埃德蒙·威尔逊文集（简本）》（纽约，1983年）第xii页和戴维·卡斯特罗诺伏所著的《埃德蒙·威尔逊》（纽约，1984年）第127—128页。《爱国者之血》问世以前对威尔逊的评论事业所作出的最有影响的消极评价，请见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所著的《以武力为后盾之想象》。（纽约，1948年）最早对威尔逊进行过研究的谢尔曼·保罗称，海曼的消极评价“是对威尔逊

几乎被所有流派完全忽视这一事实的解释。”然而根据论及威尔逊的书和文章的数目来看，他的声誉似乎并未受到这一暂时的挫折所影响。而且，后来海曼也必定对自己的观点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在出版《以武力为后盾之想象》的平装本时，他从中删去了那篇论及威尔逊的文章。见谢尔曼·保罗所著的《埃德蒙·威尔逊》(厄巴纳，1965年)第87页注。

3. 埃德蒙·威尔逊：《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纽约，1962年)第1—2页。对本书的引文在下文中用以下的形式来表示：(《爱国者之血》，页码)。
4. 如果他选择了狮子或老虎来与人类相比拟，那么比喻的效果会很不相同。虽然威尔逊认为他把人类与动物相比拟时的态度是客观的，但他也把这些比喻作为很强有力的论证手段来使用。
5. 威尔逊一向是独自一人地在向美国政府提抗议的，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见威尔逊的政治论著《冷战与所得税》(纽约，1963年)。